

革命叢書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上海民志書局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067B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目錄

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中國共產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通過——

答覆陳獨秀的來信

中共中央答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的第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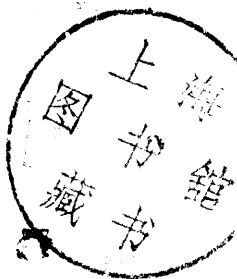
批評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意見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對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第二信的答覆

附錄

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

獨秀同志覆中央的信



奧斯克

—269674—

獨秀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



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在現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異常嚴重，國內的革命鬥爭日益緊張的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都乘時活動起來，積極的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好像與敵人聯盟一樣的來向黨進攻，這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全黨同志必須明確的認識，只有堅決的肅清黨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錯誤思想和小組織行動，才能順利執行黨在目前緊張形勢中之『擁護蘇聯』與領導羣衆革命鬥爭的任務；同時必須堅決的執行『擁護蘇聯』與領導羣衆革命鬥爭的任務，推進革命的發展，才能根本肅清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思想。

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

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甯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

(一) 他們認爲過去機會主義發生的根由，『乃是因爲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的錯誤的觀察』，因此他根本否認共產國際列甯主義對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革命開始的階段，可以與資產階級暫時聯合和加入國民黨的路線，這就是托洛斯基當時攻擊共產國際的觀點，已經共產國際批評得體無完膚。在中國革命中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中國黨當時的指導機關，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不反對資產階級，而極力向資產階級讓步，甚至無恥的投降，把共產國際列甯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論，變成了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決不是當時暫時聯合資產階級和加入各階級聯盟的國民黨的根本路線錯誤。獨秀同志不去正確的認識歷史的教訓，

只圖避免責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義的旗幟之下而誣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線為機會主義。於是，他遂與托洛斯基主義同樣的走入了更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的觀點。

(二) 他們認為「中國革命失敗了，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觀點。照這樣說，資產階級克服了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也對他讓步了，那麼，在經濟上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束縛都沒有了，可以坐享資本主義發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矛盾都沒有了，自然統治階級只有穩定，絕「沒有動搖」了。這樣很簡單的取消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自然根本把整個的革命都取消了。實際上中國革命的失敗，不是無產階級失敗，而且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得勝利。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是勝利了，但是對帝國主義是屈服了，因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強，對封建勢力

妥協了，因之，封建勢力又得到一時的恢復，所以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勢力的任務一點也沒有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一點也沒有解除，故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現在的這些矛盾，不僅沒有減少，並且日益加緊，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來。

（三）他認為『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都勝利了』，自然結論到『現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歷史證明這樣的觀點完全錯誤的，資產階級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妥協了封建勢力，而得到部份的政權，並沒有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而建立他自己一個階級的政權，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是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聯盟，國民黨就是這一聯盟的具體形式，所以他們內部才包含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各個帝國主義正在互相搶奪中國的統治，買辦地主資產階級正在互爭這一反革命的領導權，各派軍閥正在互爭地盤，遂造成不斷的軍閥戰爭，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潰的道路。

(四) 他們不瞭解這樣的觀點，因此得出極奇怪的結論，以為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一點矛盾也沒有了，而軍閥戰爭却是由於資產階級各派（重工業資本與輕工業資本等）的衝突所造成，這是毫無經濟常識之談。在一國內的資產階級內部因各種經濟原因而發生利害的衝突，發生政治的派別，可是決不能發生國內戰爭，因為在經濟上他們互相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更大於他們的衝突。在落後的農業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每個國內戰爭，都必然要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國南北戰爭，掃除封建藩屬制度的日本西南戰爭，都是一樣。

獨秀同志把這些戰爭都認作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戰爭，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聞！至於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軍閥戰爭，主要是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結果，同時也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蔣戰爭，雙方都是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其所以贊助這一戰爭，都是為着自己的利益，為着利用這一工具來擴大他的利益範圍，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勢力也是為着自己的階級的

利益，爲着利用這一軍閥來保持他的封建剝削關係。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都是要妥協封建勢力，勾結帝國主義，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沒有絲毫革命的意義，所以這樣的戰爭是毫無疑問的反革命的戰爭。

(五)他從這樣抽象的觀點出發，因此對於經濟的分析，不顧事實的而肯定「封建勢力經過商業資本的侵蝕，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伸入農村，尤其大革命的經過，已經受到最後的打擊，已經是殘餘的殘餘，」已經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剝削而「努力資本主義化」，而結論到「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只有共同點而一點矛盾沒有了」，這只是腦子裏面的幻想。實際上中國的土地關係，雖然經過長期的變遷（主要是商業資本的侵蝕與農民暴動）雖然在土地所有關係上，資本主義的形式佔優勢，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則封建的形式仍然佔極大的優勢。帝國主義商品經濟如狂風暴雨般侵入農村，使半自然經濟更加崩潰，封建地主更加動搖。可是，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却更加殘酷。大革

命的經過，的確給這樣的剝削以莫大打擊，同時，在革命失敗以後，這樣的封建剝削關係，又得到一時的恢復，地主階級的勢力又得到暫時回光反照的機會。同時現在全國的情形，支配全國的經濟生活的：第一，是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剝削關係；第三，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剝削。資產階級雖然企圖發展資本主義，封建地主也想蛻化爲資產階級，可是受着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無法實現這樣的企圖，因此資產階級便不能放棄他的改良政綱的鬥爭（但這一鬥爭因爲畏怕工農民眾起來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結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而封建勢力更加要保持並且要更加緊他的封建剝削，這是明顯的客觀的事實，任何人只要能拋棄腦子裏的幻想與成見，細心的去研究中國經濟關係，都能了解這一正確觀點。

（六）因此他所承認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來的可能』與六次大會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來』的意義完全不同。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意義是

指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仍然在極野蠻的統治中國，封建階級仍然是任加緊他的殘酷的剝削。資產階級因為得不着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讓步，只有更厲害的向工人進攻，那麼，廣大勞苦羣衆找不到第二條出路，因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反資產階級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來。所以現在各地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突起，工人鬥爭的發展，農民暴動之不斷的爆發，決不是甚麼『革命失敗的餘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顯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徵。他們否認這樣的前提，他們認為帝國主義讓步了，而且幫助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了，（那麼所謂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便成了一句空話！）封建剝削更沒有了，那麼，沒有什麼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對資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們否認現在廣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不斷的暴動是革命高潮的象徵，而且否認一切的革命象徵。六次大會與中央指出這些根本矛盾沒有解決，所以統治階級是走向崩潰，而革命形勢是走向高潮，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

爭開始復興。他們只承認工人與資本的矛盾一點，同時又認爲現在工人的鬥爭『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麼所謂『革命高潮必然有再來的可能』只是與『我們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共產主義必然得到最後的成功』一樣的毫無現在實際策略意義的話。他們以爲『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會到來是取消派的見解，』其實說革命高潮永遠不會到來，何只是取消派的見解，而且是瘋子，或者是資產階級的幻想，所謂取消派的觀點正是如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承認須經過統治階級的穩定，然後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見。

(七) 依據他們的觀點，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那麼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來，而是統治階級穩定不可避免到來，根據這樣的觀點出發來決定策略的路線，自然要在原則上採取合法運動，而『國民會議』應該是中心的口號，蘇維埃的旗幟只好取消。獨秀同志却是很怯懦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樣的公開主張合法運動與國民會議。只是消極的攻擊中央的路線，攻擊中央號召『

五卅』『八一』……的示威運動是盲動，是玩弄，不敢公開的提出積極主張。

實則在他們的觀點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動了。所以借着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話，透露他自己的觀點。如果他的主張真是如當時列寧的主張一樣，那麼，決不會覺得中央是盲動。因為中央的路線只是反對合法主義（帶血熱性的合法），並沒有拋棄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積極指出要利用公開與合法的可能來發動廣大羣衆，組織廣大羣衆。同時既然統治階級是在走向崩潰，羣衆鬥爭是開始復興，那麼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來組織羣衆，光只注意領導羣衆的日常鬥爭是不夠的。必然同時要領導羣衆的鬥爭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動，以擴大黨在羣衆中政治影響。如果說這是盲動，這只是從他的取消觀點出發的取消辦法，根本上與第三黨的口號毫無二樣。

（八）從他們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分析，認為農村經濟關係主要是資本主義剝削，於是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農貧農對富農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鬥爭，地主的封

建剝削只是殘餘的殘餘，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們認爲『富農是反革命的，中農是中間動搖的份子，只有雇農貧農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們的策略路線是『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反對富農』，這又是對於土地革命對於農村鬥爭策略的取消觀念！事實上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主要是地主軍閥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封建剝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只是與地主階級利用土地使用關係對農民的剝削相互勾結着，並且多半是豪紳地主兼營，至於富農對雇農的剝削在整個的農村經濟關係中，還是次要的地位，所以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對抗。但是中國富農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剝削，他不能堅決參加反封建的鬥爭，所以現在農村中從雇農至中農都是遭受封建剝削的革命的羣衆，富農是動搖以至反革命的份子，所以我們農村鬥爭主要的口號是土地革命，鬥爭的策略以雇農爲主要基礎，聯合中農，反對富農，如果現在不以反軍閥地主封建剝削爲中心口號，決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如果不與中農結成鞏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決不能推翻統治階級。

所以他們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辦法。

(九)黨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據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客觀的白
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幫助俄皇憲兵』(列寧
這樣說過)的辦法；如果主觀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而要想擴大黨的民主化，只是
放任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傾向在黨內發展。現在中國黨的情狀，主觀上無產階
級基礎既弱，尤其是客觀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殘酷，加以革命鬥爭又異
常緊張，國內軍閥戰爭，國際的反蘇聯戰爭都擺在黨的前面，他們却在這個時候要
求公開討論一切不同路線的意見，要求把反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意見都公開在黨
報上發表，要求從支部到中央都實行民主的選舉，這無異於要求黨放棄目前實際的
革命鬥爭的任務，來實行黨內清談。要求鬆懈黨的極端祕密的組織好護警察巡捕
得以大施破壞。至於因為中央要求全黨同志服從黨的決議，在黨的策略上一致行
動，便說：『這是命令主義』『這是一貫的命令主義』，這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思

想，列甯黨的服從多數，服從上級黨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的根本原則，絕不能容許這樣無政府的思想來破壞的。至於主張黨內和平，不過是要求黨放棄對於一切不正確傾向的指斥，放任這些傾向在黨內發展。誣衊中央用『警察政策』，這更是學習托洛斯基攻擊俄黨的最卑污的挑撥離間的手段。可惜太不聰明了，因為把這些話用到中國黨來，只有得到全黨同志的嘲笑與憤慨的回答！

依據上面的分析，他們的觀點與路線都是一貫的取消主義，他們分析革命失敗的根由是反對共產國際整個的路線；分析中國經濟政治的狀況，取消了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鬥爭，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勢，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與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這樣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張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罷工與示威，都成爲玩弄與盲動了。在組織上自然要成爲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不要紀律，不要服從上級黨的決議與指示，主張黨內和平，一切不正確思想都有權利在黨內自由宣傳。這便是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整個的路線。

這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中央認爲這樣的思想在黨內發展，不止是破壞黨執行目前迫切的革命任務，而且可以使黨分崩離析以至滅亡。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堅決站在共產國際，六次大會與中央決議之上反對這樣取消主義的思想，把牠徹底肅清。

現在黨內還有一種嚴重的調和派的傾向，如說『托洛斯基主義是有理論的系統，我們不好簡單的批評他。』『他們固然錯誤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對的』，……等，這樣調和的觀點，只是糲糊同志的觀念，鬆懈黨對於取消派的攻擊，掩護取消派的思想在黨內發展，想拿一些技術的，非政治的問題，來動搖黨爲正確原則的爭鬥，爲列甯主義路線的爭鬥。他們與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原則上是一樣的動搖黨的路線的。並且不肅清調和派的傾向，決不能執行反取消派的鬥爭，所以反對調和思想的鬥爭與反對取消派一樣的重要。

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原則，在未開新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全黨同志都必須

絕對服從最後一次大會的決議，違反大會決議的觀點，絕對不能容許在黨內自由討論，並且現在革命鬥爭異常緊張的時候，煽起黨內原則不同的討論，毫無疑問的是阻礙革命鬥爭，破壞黨，客觀上便是幫助敵人。所以中央認為這樣的思想，必須迅速的把他肅清，尤其不應該因為這樣的討論而鬆懈領導羣衆鬥爭的工作。

現在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了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反對派已經有他們的祕密刊物，在黨內傳播，獨秀同志也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這是列甯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爲。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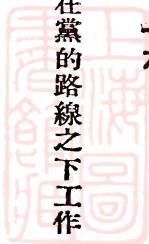
(一) 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與以組織上的制裁。

(二) 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

(三) 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中央認為在目前革命鬥爭緊張的形勢之下，上面的決定，是鞏固黨，使黨能堅決執行領導革命鬥爭任務的必須的方法，中央號召全黨同志一致起來，擁護中央的決議，肅清黨內取消主義的思想與一切反黨的小組織。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十月十五日通過



答覆陳獨秀的來信

奧斯克

自中東路事件發生以來（從搜查蘇聯領事館，宣佈所『搜獲的』公然捏造的文件，逮捕無數的蘇聯人民，驅逐出境，或幽禁虐待，非法強佔中東路，開除蘇聯職工，解散鐵路工人工會，以至請求帝國主義列強干涉，等等），南京政府除了向蘇聯實行其挑釁的政策之外，對於蘇聯的一切和平解決的提議，更加以狡滑的拒絕：這把中國反動統治的反蘇聯的政策很清楚的揭露出來了。很顯明的，他們的目的，決不是求一和平的解決，而是挑動起反蘇聯的戰爭。

南京政府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傀儡，牠的統治完全靠帝國主義者的武裝維護與最殘酷最普遍的白色恐怖，牠簡直不能單身獨馬的採取這種反蘇聯的路線。牠是中國勞苦羣衆民族革命的理想與鬥爭之最凶悍的敵人，牠加入了帝國主義反蘇聯的聯盟，做了英，美，日，法主人最甘心最服從的工具。他們把中國拉入了反革命的

營壘之中，企圖包圍破壞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一切被壓迫殖民地民族的朋友，蘇聯帝國主義者挑唆中國的反動派向蘇聯挑釁，以便造成一個以保衛中國的名義而進行國際干涉，反蘇聯戰爭之漂亮的根據，他們的這種用心，從他們的言論以及行動上看，均使我們沒有置疑的餘地。中東路事件一發生，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社會民主黨的工具的路線，已經就是如此——要實行公斷，實行共管中東路，用等等形式，種種藉口，進行其國際干涉的準備。

這一事實的意義，對於一切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及革命黨人，是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反蘇聯聯盟的計劃已經很快的完成了。現在不拘什麼時候，只消捏造一點『事件』，國際的干涉與反蘇聯的戰爭便可以開始。蘇聯處在直接的巨大的危險之中；世界革命的中心被威嚇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被世界帝國主義反革命的集團包圍了，恫嚇了！全世界的革命運動都受着攻擊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黨的任務是很明顯的。必須以最大努力去動員黨的一

切力量，徵集勞苦的羣衆，爲『擁護蘇聯』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的總任務而鬥爭。蘇聯的失敗就是全世界勞苦羣衆的失敗。蘇聯的失敗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又受一時期的反動統治與無限制的壓迫與剝削之信號。

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是國際階級鬥爭最尖銳的表現。這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爲掙扎其存在而反對日見增長的世界革命的力量之戰爭，是世界革命勢力與反革命之間尖銳的鬥爭。這是世界反革命勢力向革命勢力中心的進攻。必須以全世界的革命戰線與擁護蘇聯的鬥爭去回答牠。

國民黨及帝國主義者，在反蘇聯戰爭的準備中，很主要的一部份工作就是對於反對他們反革命企圖的一切力量，特別是爲革命勢力之中心與領導者的共產黨，施以最殘酷的恐怖手段的壓迫。同樣重要的手段是在『擁護民族利益』『打倒赤色帝國主義』最卑劣的口號之下進行他們反對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欺騙宣傳。他們用盡一切壓制的手段防止勞苦羣衆反對戰爭政策，防止他們反對日見增加的痛苦

——這是戰爭必不可免的結果。自從奪取中東路以後兩月以來，所以有這種日見增加的白色恐怖，新工會法，蔣介石所召集的剿共會議，以及許多其他壓迫的表現——準備反蘇聯的戰爭，是其根本的動機，而且只有在這上纔能了解這樣壓迫手段的意義。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爆發，是第二國際的一種試驗，牠的腐爛的機會主義因此完全暴露了，第二國際公開的或在種種掩飾之下做了工人隊伍中製造戰爭的代理人。現在帝國主義者反蘇聯的戰爭準備又是我們黨的一個試驗，我們的黨却很勇敢的應付着。但是，同時，階級鬥爭的日見激烈化——這與戰爭準備相並發生而且成爲戰爭準備的基礎——敵人在思想上向蘇聯及我黨的極力的進攻，以及南京劊子手的白色恐怖，這些都要暴露出黨內動搖的份子之存在，這一事實我們決不能加以忽視。這些動搖的份子，迴避了擁護蘇聯的困難與危險，遂企圖藉着攻擊中央的正確政策所根據的根本原則，以掩飾其懦弱的態度。他們爲要尋找離開黨在這

般緊急時機的鬥爭的藉口，就不惜向中央的政策，中央的指導，與中央的負責同志做種種誣蔑的攻擊。他們迴避了擁護蘇聯的鬥爭，而企圖藉着「左」的托洛斯基的論調，向黨的政策做鬥爭，以掩飾其根本機會主義的立場。客觀上（如果有些情形不是故意的）他們會混淆了黨的擁護蘇聯的無上的任務（現在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方式的鬥爭），而將這一根本任務轉變成關於黨的政策的分歧的討論，這樣的作用客觀上便是幫助反革命派破壞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計劃，而把勞苦羣衆的反抗力量大大的削弱了。

黨內這些動搖的機會主義的分子（以及一般失望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所形成爲托洛斯基反對派的小組織）之最顯明最有系統的表現，就是陳獨秀給中央常委同志們的信，有兩封信以及中央的答覆都在紅旗上披露了。在假借討論宣傳方法的名義之下，前兩封信站在一個很明顯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攻擊黨關於中東路問題的政策。第三封信便向黨的總政策及其指導作駭人聽聞的攻擊；在討論政策上一般的

問題時，他採取了一種『激烈的』托洛斯基派的態度，但是在討論具體的鬥爭形勢時，却表露出一種機會主義的根本觀點了。

陳獨秀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估量，主要的是沒有階級的內容，而且把帝國主義干涉蘇聯與反蘇聯戰爭之主要的當前的危險完全掩蓋住了。他承認『這一問題不是簡單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卻輕輕形容他是『國際糾紛問題之導火線』。但是他沒有看見，這決不僅是一種『國際的』糾紛，而且在實體上，如中央很正確的說，『是全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鬥爭』。他把這一形勢的迫切的危險完全估量得太低了，他說，『由這導火線而至爆發戰爭也許是慢性的』，『誰都不敢斷然取獨佔的形式，會需要經過一些曲線的鬥爭』。這一古怪的分析的結論必然是：沒有當前威嚇蘇聯的巨大的危險，所以黨沒有徵集羣衆作擁護蘇聯鬥爭之迫切的需要。如果承認了這個，那就完全任着帝國主義者及其國民黨走狗毫無障礙的去進攻蘇聯，——這真是豈有此理。當他說『中國不利於輕率開戰』時，他完

全忘記了南京政府必須奉帝國主義主人們的命令這一回事了。

在估量中東路問題的發展的前途上，他舉了兩種可能的形式。一是蘇聯始終採取強硬政策，這樣帝國主義者必向蘇聯進攻；一是蘇聯採取退讓政策，這樣帝國主義者之間必然因互奪中東路遲早要導入第二次大戰。這種分析是最危險不過的。牠把蘇聯的真正的政策完全給遮蓋住了；蘇聯的政策，可以說是『強硬的』，因為蘇聯政府應堅持牠自己的權利，但是，同時蘇聯雖然受了許多無可容忍的挑釁，却用一切力量以尋求一和平的解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將這一政策向羣衆做普遍的宣傳。陳獨秀的這一分析，客觀上便把將來任何發展的責任，完全放在蘇聯的肩上，而忽略了現時的形勢完全是帝國主義者造成的，並且，除非以勞苦羣衆的力量與蘇聯聯合一致強迫他們退却，那就不論蘇聯的政策如何，帝國主義者必然是以武力干涉蘇聯，向蘇聯開戰的。他認為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戰爭有同等的可能，這又把主要的危險掩蓋住了。這簡直是一種欺騙。中

東路問題，如中央正確的說，是發生於現在世界的蘇聯社會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除非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強迫帝國主義者退却，帝國主義是必然繼續向蘇聯進攻的。把反蘇聯戰爭的危險與帝國主義者戰爭的危險平列起來，就只有把黨的擁護蘇聯的任務轉變成一般反戰爭的運動。這樣實際上就是等於反對蘇聯。我們的任務並不是要提倡一般的反戰爭的運動，而是準備羣衆領導羣衆，去實行擁護蘇聯的具體鬥爭。陳獨秀的這一分析絕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而是機會主義的方法，使羣衆脫離具體的，直接的鬥爭，迴避一切的困難與危險，而單單高談闊論，或是輕輕的抗議。

根據這種非階級的，完全錯誤的分析，陳獨秀進而有意的誤解中央的政策而且加以攻擊與批評。中央的政策是，現時的工作要以擁護蘇聯做中心。而陳獨秀卻說，「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我們的政策（陳獨秀很狡猾的說是「宣傳方法」）「似乎不能像別國的兄弟黨那樣簡單，即是說，單是世界革命的

大道理』。如果這話有半點意思時，那他的意思是說。據他的意見，我們的兄弟黨只需要談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以便奪取羣衆，擁護蘇聯，而中國黨正企圖也要這樣做。這一觀察是絕對的錯誤。帝國主義向蘇聯的進攻，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是有嚴重的意義的，中國及各國兄弟黨都把這一問題很正確的聯系到這一過程上，各國黨的工作就是要把目前的形勢做爲發展並深入世界革命的手段，而不是任着帝國主義者予世界革命以一打擊。這與『單是』說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迥然不同，那一說法，是托洛斯基派的鬼計，陳獨秀，如果不是在組織上，也是在客觀上與他們結合起來了。因爲他不能，或者他不願意看見反蘇聯戰爭之直接的危險與動員羣衆反對這一干涉之必要，所以他說，把號召羣衆『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的口號做爲中心的口號，是『太說教式了，太超羣衆了，太單調了』。他埋怨說：『對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體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中東路問題，是帝國主義挑唆國民黨軍閥實行向蘇聯挑釁，悍然不顧一九二四年

的中俄奉俄的協定，而以武力佔據了的。我們爲這一『具體』問題的鬥爭，是主張回復中俄協定時的共管狀態。在協定中所載收回中東路條件，是比中國境內其他鐵路（如南滿）之收回，於中國更爲絕對有利。就目前的形勢說，關聯到收回中東路的問題，必須首先援助蘇聯政府的政策。

陳獨秀因爲估量錯了現時形勢及其發展前途，因爲誤解了中央的政策，於是進而舉出了另一政策。在機會主義的形勢估量上，只有提出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他的論調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的——羣衆是落後的，我們現在的口號只能達到最覺悟的無產階級份子，而不能深入廣大的羣衆，所以，我們必須降低我們的口號到落後羣衆的水平線上！實際上這就是主張放棄牠的領導任務，不站在羣衆的前面，而變做羣衆的尾巴。一九一四年在世界大戰開始時，列寧，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反戰爭的革命口號只能達到最覺悟的無產階級份子，一般落後的羣衆都被製造戰爭的愛國主義與其社會民主黨的走狗的『保護祖國』的欺騙給蒙蔽住了，他們都

向列寧們唾棄，而且譏笑列甯們的口號。然則，列甯，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曾降低了他們的口號到落後的羣衆的水平綫上麼？沒有，絕對沒有！他們在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史中，做了很艱苦的鬥爭，不論製造戰爭者與社會民主黨如何憤激，不論落後的羣衆如何反對，他們不顧一切的堅持他們明顯的革命的反抗戰爭的政策，就是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所暫時麻醉的羣衆中，依然號召革命的國際主義，以階級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如果他們降低了他們的口號，他們早就落到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同樣的泥坑中，他們早就失掉了最覺悟的無產階級，使他們沒有了領袖了。但是，因為他們堅持了他們的明顯的階級路線，遂能夠團集這些『最覺悟』的無產階級於他們的周圍。這些最覺悟的無產階級，當着落後的羣衆脫離戰時愛國主義的幻想，了解戰爭的掠奪性與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性時，就變成了領導他們的組織上的基礎。

在陳獨秀的信中，他並沒有一個地方很積極的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這很

明顯的表示出他的傾向。

第一，他說：「帝國主義間的第二次大戰在中國做戰場，或是帝國主義利用中國進攻蘇俄，所加於中國民族的災難，都是實際可能的前途。只有這樣的宣傳，纔能夠把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這樣，據他的意見，最大的危險並不是蘇聯受帝國主義攻擊，而是帝國主義要利用中國進攻蘇聯，因此就加給中國民族的災難。他把進攻蘇聯的反革命的戰爭與帝國主義強盜之間的戰爭平列起來，這必然引到這樣的結論：勞苦羣衆對於這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戰爭之態度，應該是同樣的。因此，他不積極的提出擁護蘇機反對帝國主義進攻的口號，而很懦弱的提出醜陋的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反對戰爭危險』的口號。這在實際上是幫助了蘇聯與中國革命的敵人：國民黨說：『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牠擾亂中國，向中國宣戰，使中國民族遭受災難』。陳獨秀就會建議說我們要這樣回答：『反對戰爭的危險，因為戰爭使中國民族遭受災難』。這夠多麼懦弱！多麼無力！

既有了和平主義的口號，同時就必有和平主義的實際，這種和平主義的實際，據我們所知，數十年來的經驗都證明是否認反對戰爭的階級鬥爭，放棄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鬥爭，而贊成消極不動，並壓制一切對於戰爭準備與戰事之一切有效的抵抗。

第二，「然後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這個名詞更能使羣衆親切的了解）」這是反對中央的一種更拙笨的企圖，他以爲中央「單是」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而忽略了民族的問題與羣衆的利益，這自然完全不合事實。中央提出擁護蘇聯是黨的中心口號，但同時根據民族革命的，工業的，文化的，各省的以及其他的羣衆利益而提出了領導羣衆的其他口號，以便向實現總的口號而鬥爭。另一方面，陳獨秀很明顯的以爲「擁護蘇聯」的口號是與「民族」的利益對立。他從這上就降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上去，並採用了並非民族革命的口號，而是第三黨，改組派的口號了。「反對國民黨的誤國政策」這是共產主義的字典中聞所未聞的！這正正是「左派」資產階級的路線，他們利用牠來說，

在朝的蔣系是『誤國』的，違反了第三黨與改組派所代表的一部份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口號絕對沒有階級的內容，而且決不能徵集羣衆向南京政府做革命的鬥爭，恰恰相反，牠是第三黨與改組派麻醉羣衆的口號，他們企圖轉移羣衆的革命力量去擁護他們自己，實行反革命的鬥爭，以這一系反革命的統治者代替另一系。這一口號現在更是特別危險，因為他們反南京政府的鬥爭已經加緊，而演成公開的戰爭了。我們的路線必須絕對的是：反蘇聯的戰爭就是反對中國革命的戰爭，我們爲要完成中國革命，就必須擁護蘇聯，牠是中國民族革命鬥爭中中國羣衆的朋友。

第三，『然後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借中東路問題向蘇聯進攻的陰謀』。這除了使人不注意擁護蘇聯的積極任務，而注意一般的反帝的宣傳之外，簡直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這種反帝的宣傳祇是擁護蘇聯的鬥爭中之一部分。但在陳獨秀的意見，却把牠代替了主要的鬥爭了。所以，他只提出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而沒有一句是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挑釁之後必然以國際干涉的

方式繼續向蘇聯挑釁。進攻蘇聯已不是帝國主義者腦筋中潛伏着的「陰謀」，而是現在駭人聽聞的事實了。進攻蘇聯的第二步，公開的干涉與戰爭，是必然隨着而來的，只有蘇聯工農與全世界的勞苦羣衆在擁護蘇聯的口號之下的聯合戰線的力量纔能打退帝國主義的這一進攻。

但是陳獨秀並沒有積極的提出擁護蘇聯。就令沒有關於形勢的錯誤的估量，對中央的批評，以及所提出的另一路線，單是這一事實就已證明他在這問題上採取了一種澈頭澈尾的機會主義的態度。

在他第二封信中，——中央對這信已有根本正確的答覆——他企圖藉着冗長的哲學討論以掩飾他的機會主義，而且只在文字上承認擁護蘇聯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他不僅沒有取消他從前錯誤的批評與機會主義的提議，而且更變本加厲，向中央做種種不可寬容的攻擊，如說中央不懂得原則與策略的分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簡單化」了（這是很狡滑的說法，他本意是說「糟塌」了，欺騙黨員，而且

是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中央對這一封信的回答是很細心的做理論上的說明，是根本正確的。

雖然如此，陳獨秀仍然很固執他原有的態度。他不但很頑固的否認中央路線之正確，而且繼續發揮他對中央非常的攻擊。從他第二封信中，就可以斷定，他的第一封信決不是如他所說，只是宣傳方法的批評，而真正是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攻擊基本的原則，這些基本的原則是共產國際的每個支部在擁護蘇聯的口號下所引以為根據的。他的第三封信便突然完全不談中東路問題了。中央的嚴厲的與根本正確的回答逼使他辯護他自己機會主義的態度，而向中央的整個政策，中央的指導，以及中央的負責同志，做橫掃的攻擊。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在世界第一個工農的國家處在危急存亡的時候，陳獨秀完全不理會如何動員羣衆擁護蘇聯，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在黨應該最一致最鞏固最堅決的時候，他偏偏向黨的指導機關做分裂的，不正當的攻擊。這樣的行動，只能說是客觀上反革命的行動，因



爲他轉移黨員的思想與活動，使之脫離擁護蘇聯的無上任務，削弱中央的威信，減低黨在羣衆中的信仰。這樣的行動只有爲敵人階級所賞識，因爲他們自己還不能收到這樣好的效果，而一切共產黨人，所有蘇聯的朋友却必然加以極力的排斥的。

機會主義者，假藉『左』的論調，以掩蓋其機會主義的錯誤，是他們得意的把戲。陳獨秀在他第三封信中就正是這樣態度。他從前兩封信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一躍而與『左』的托洛斯基派的論據與方法很狂熱的結合起來而且拚命的應用了。

他很虛偽的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他很不顧羞恥的說，直到今天黨的機會主義時代的政策，『一點也沒有改正』。他說，中央還不認識革命的失敗，統治階級（國民黨）的階級性，以及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危險，而現在只是兩個革命高潮中間的過渡時期。他更說，機會主義是中央的一貫的總路線，另外還有盲動主義，命令主義，

取消黨內的德謨克拉西等等錯誤。他的關於中國革命鬥爭以及國民黨階級性的估量是與托洛斯基派一模一樣的。他說，中央對富農的態度是猶疑的，而事實上中央的態度已在農民問題的決議中很確定的指出。在目前時期的性質的估量上，他又重演他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他誣蔑了全體黨員，他竟提出了這樣不可饒恕的質問：『各個黨員都有政治自覺，能夠自動的奮鬥活潑有生氣的黨在那裏？』

是的，陳獨秀，向總的政策做『左』的攻擊以企圖掩飾自己機會主義的錯誤，在你決不是第一個機會主義者。我們在國際的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人，這些人也通常發生於反革命勢力向黨進攻，使黨的工作愈加困難危險的時候，和我們現在的情形是一樣的。他們也是和你一樣，在當着具體的鬥爭問題之前，把自己完全暴露了。機會主義的說法，認為『中國革命高潮有再來的可能。』，『但現在不能很快的到來，現在還沒有到來的象徵。』，這種說法必然使他攻擊中央的正確的形勢估量，而說是『盲目的過分的估量』。機會主義會瞎着眼睛不去看反蘇聯戰

爭的危險，必然使他尋找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前退却的藉口，而反對黨所領導的擁護蘇聯的一切示威與羣衆的其他行動，硬說是：「盲動主義」！

是的，陳獨秀，在企圖轉移黨的路線，脫離具體的困難的鬥爭而去進行分歧的一般的討論的機會主義者中。你又不是第一個。我們決不受這種欺騙。我們不迴避和你討論，我們已經發表了你的信和我們的答覆了。但是決不允許你發展這裏分裂的討論，而且不容許你防礙黨的動員羣衆擁護蘇聯的任務。你的信將要對全黨表露你所代表的弱點與危險。並且使我們嚴密我們的隊伍，加緊我們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

二中全会與中央的決議，就是對於你對中央政策的攻擊的回答，揭露了你的無恥的誣蔑，把你對中央的無謂的攻擊打得粉碎，你的這種攻擊，竟說中央形成一種官僚的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你在第三封信中的建議完全不是根

據真實事實與需要，而是根據你自己錯誤的論斷，並有意向中央攻擊。

同志們不要上了陳獨秀錯誤論斷的當，而削弱了反對進攻蘇聯的力量。如果
是這樣，那就是一種反蘇聯的罪過，反對中國革命，反對世界革命的罪過。黨的政策與指導是根本正確的，健全的，雖然當前遇着了嚴重的困難。黨對中東路問題的
政策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且各級黨部及同志們都必須積極的執行。沒有一個
同志要否認，中央也決不否認在正確政策的運用中，在運用政策的結果中，曾有
某種弱點與錯誤。但是這些弱點是發生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我們工作的絕對
祕密的狀態中，以及我們黨的主觀的弱點上。只有積極的細心的集中力量執行目
前黨的主要任務，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向中國革命的進攻，黨
的這些弱點纔能克服，我們的工作纔能更加進步。

九，十，一九二九，莫斯科

中共中央答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的 的第一信



獨秀同志：

讀了你二十八日關於中東路問題的意見以後，覺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

一 中東路問題很明顯的是反映着現在世界的蘇聯社會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鬥爭，帝國主義有計劃的進攻蘇聯的表現。如果認為這是『中俄兩國間的糾紛』，或者是『國際糾紛問題』，這就離開了階級的觀點。走入了社會民主黨的，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觀點。

中東路問題既然是由於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蘇聯的矛盾，所以這一事變發生的

前途，將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的爆發；固然帝國主義間因爭奪中東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礙着他們馬上對蘇聯的武裝攻擊，但是他們在對付蘇聯的一致的目標之下，仍然要企圖以共管中東路以及其他的方法來暫時調協這一矛盾。所以中東路問題最危險的前途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如果解釋中東路事件而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這兩個前途平列起來，不只是迷亂了羣衆對於主要危險的認識，而且這一分析的根本以上就是離開了階級觀點得出來的結論。

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雖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質，但是他的內容完全不同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反革命勢力內部的戰爭，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反革命勢力進攻革命勢力的戰爭，我們須公開的明白的把這一分別告訴廣大羣衆，然後羣衆才能知道對付這樣兩種不同的戰爭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說「不管那一種，中國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躪」，那麼，羣衆將要走向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影響之下，盲目的反對戰爭，就會說「國民黨和蘇聯都要不得，造出戰爭來

蹂躪我們，雙方都要打倒」。國民黨馬上來一個欺騙宣傳，造一個假電報說「蘇俄先開砲，戰爭的災禍應該是蘇俄負責」，馬上可以把羣衆轉移到仇視蘇聯。所以這樣的分析就可以成爲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理論的基礎。結果便是幫助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宣傳。

二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是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我們目前的任務與廣大羣衆的要求，都是爲着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但是民族解放與世界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不是對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離的。事實上一方面是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廣大羣衆很容易認識誰是他的朋友，誰是他的敵人。而且可以進一步的認識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投降到帝國主義的方面，決不是爲了中國民族的解放，而只是爲着自己剝削勞苦羣衆的利益，犧牲民族的利益。國民黨雖然極力宣傳他的虛偽的民族主義，拿出「擁護中國」與我們「擁護蘇聯」的口號對立起來，以企圖欺騙廣大的羣衆，但是，只要我

們能堅決的指出這個口號的真實的意義和利益，廣大的羣衆很快的可以答覆他：『擁護中國革命必須擁護蘇聯，擁護蘇聯就是擁護中國革命』。

你以爲這種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羣衆了』，實際上『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的口號，廣大羣衆不只是聽到了共產黨的宣傳，而且在過去革命時期（當然有資產階級的階級覺悟者除外）都在自己實際鬥爭的經驗中了解了這一事實。

中國大革命決不是空過了的，的確訓練了廣大羣衆的政治認識，只要我們的宣傳能夠深入，是不難揭破國民黨的欺騙的。現在廣大羣衆還沒有在『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口號之下積極起行動起來的原因，固然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是有相當的影響，但是主要的還是白色恐怖的鎮壓與我們的宣傳還沒有十分深入。

就是中國羣衆真正如你所想像的這樣落後，我們亦不應掩諱正確的觀點，降低我們的口號，跟着羣衆的落後意識跑，尤其不應該如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羣衆，因爲這樣不只是不能取得羣衆領導羣衆，而且要幫助資產階級欺騙宣

傳的擴大。所以我們應該勇敢的公開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羣衆解釋，廣大的羣衆必然在自己的鬥爭中得到證明，而一天一天的團結到我們口號的周圍。如果避免『擁護蘇聯』的宣傳，首先我們自己就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更無法使廣大羣衆來了解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這樣的指出是毫無疑義的正確的。

你所提議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左派在野黨（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這一口號的意義就是說『你們收回中東路的政策定要引起世界大戰，要使中國受到更大的損害』。在朝黨蔣介石會馬上答覆說：『不會的，我們有世界列強的援助，蘇聯決不敢開戰，列強因為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的敵視，他們也不敢自己打起來，我們便可以操縱其間，取得中東路的實際的利益』。這樣便使廣大羣衆對於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實際利益的觀點完全模糊了。就是單純的提出『反對賣國』的口號也還是使羣衆模糊，國民黨還可以用詭辯狡詐的方法來欺騙羣衆，一定要明顯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

國民黨無法狡賴，使廣大羣衆的認識不致模糊。

三 中央四十二號通告中指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發……」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許』。我們必須把這一前途明顯的告訴羣衆，才更能使羣衆瞭解蘇聯的勢力是建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基礎上，在反蘇聯戰爭的時候，一定要堅決的起來與反革命勢力決鬥，才更能堅定羣衆以國內戰爭來答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的決心。所以中央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無疑問的正確。

四 總觀來信的內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討論，實際上是有極大的原則上不同，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發生策略上的不同。

中央熱誠的希望這一解答的信到達以後，很快的得到你取消這些觀點的申明。中央始終是希望同志公開的發表對於政治對於黨的意見，並且始終是極誠意的來討論同志們的意見，從沒有甚麼誤會與揣測。尤其是每一個布爾塞維克的同志

都不應恐怕他人的誤會與揣測，而隱藏自己的意見。中央以布爾塞維克的熱誠，準備接受你以後對於重要問題的意見。此致

布爾塞維克的敬禮

中央

八月三日



批評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意見的機械主義的錯誤



看了獨秀同志解釋他的觀點的第二封信以後，覺得他只是對於自己錯誤觀點的文飾，並沒有接受中央正確的批評，而改正他自己的錯誤。雖然他聲明與中央沒有原則上的不同，中央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在原則上是對的；雖然把他在第一次信中提出的，認為『更能使羣衆親切瞭解』的，『誤國政策』的口號，很巧妙的，狡猾的，敷衍過去了，實際上完全是辯護他原有的錯誤觀點。中央認為這一錯誤觀點，是極有害於革命的鬥爭，有害於黨對於中東路問題的整個的路線，必須給以嚴厲的批評，使全黨同志得到正確的瞭解。

一、中央分析中東路問題，從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根本矛盾，與帝國主義

企圖首先消滅蘇聯與鎮壓殖民地的革命的觀點出發，指出中東路是帝國主義有計劃的進攻蘇聯鎮壓中國革命與瓜分中國的表現，當然他們內部還包含了互相爭奪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進攻蘇聯的戰爭仍然是目前中東路問題的主要的危險。獨秀同志分析中東路問題，認為『不只是簡單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且是國際糾紛問題的導火線』，因此在前途上有兩種可能的形勢：『一是帝國主義在援助中國名義之下共同向蘇聯進攻；一是蘇聯若取退讓的政策，帝國主義必然互相爭奪中東路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央認中東路問題的前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是主要的危險，而獨秀同志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與帝國主義間相互的戰爭是兩種可能的平列的前途，這是原則上的第一個不同。中央認識了現在世界總的形勢，進攻蘇聯戰爭，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都同樣緊張起來，但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是有帝國主義主觀上進攻蘇聯的作用，所以指出中東路問題主要的危險是進攻蘇聯的戰爭，這正是馬克斯的辯證的唯物論的分析方法。而獨秀同志只認識了客觀的總的形勢

，而忽視了帝國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觀的作用，所以把兩種戰爭的危險平列起來，這不只是十八世紀的機械的唯物論者的觀點，而且根本上離開了階級的立場。譬如他說『日本覺着中東路落到美國手裏，比暫時留在蘇聯手裏對於牠更是不利』這一句話意義的解釋，日本竟可以與蘇聯聯合起來對抗美國了，這裡面有一絲的階級觀點沒有？

中央根據正確的分析得出來的主要的危險是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戰爭，因此站在世界無產階級與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的觀點上而提出『反對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的口號。獨秀同志根據他的觀點得出來的主要危險是『戰爭』，所謂『無論那一種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把中國做成塞爾維亞』，於是站在他的『擁護中國』的觀點上而提出『反對國民黨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這是第二個原則上的不同點。

他說『在原則上……不但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而且以前我們宣傳這一口號

太不充分，不過在含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這個特殊事件便要小心些，單只這一口號便不夠了』，似乎中央指摘他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的錯誤，是造謠冤枉他一樣。試看他第一信上的說話，到底是不是冤枉他？

『帝國主義間的第二次大戰在中國做戰場，或是帝國主義利用中國進攻蘇俄所加於中國民族的災難，都是實際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識的人，一經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瞭解；而且只有這樣的宣傳，才能夠把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後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這個名詞更能使羣衆親切的瞭解），然後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藉中東路問題向蘇聯進攻的陰謀，才能夠得到廣大民衆的同情』。

在這一段話上面，最後的一個『然後』，還沒有『擁護蘇聯』的口號，很明顯的不要『擁護蘇聯』的口號；就令他還有一個『然後』，然後提出擁護蘇聯，沒有說出來，也是只有到了將來第三個『然後』的時候才能提出『擁護蘇聯』，現在是

不應該提『擁護蘇聯』，很明顯的現在是要把他的『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就充分證明他用『只是』兩字來掩蓋他自己的原則上的錯誤觀點只是一種狡辯，完全不是布爾塞維克公開的承認錯誤，自己批評自己的精神。

二、『擁護蘇聯』，在原則上既然是正確的了，那麼，我們在策略上是不是要明顯的提出這樣的口號？獨秀同志的意見以為『有時因為時空性上有需要經過曲線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勢不同的策略』，因此他主張對中東路問題的策略『首先指出……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提出『擁護蘇聯』（第一信的原文上是沒有的，依據他的第二信的解釋，替他補充上去）。這樣的『曲線』論，真是與列寧批評少數派學得以前經濟派策略過程的『階段論』毫無二致。

『臨時大會派（即少數派）現在觀察革命問題，與以前經濟派觀察八小時工作制問題所持的態度，毫無二致，（一）十小時工作時間制，（二）九小時工作時間制，（三）八小時工作時間制，從這種策略的過程，後來得到甚麼樣

的結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裏用不着細說。現在的臨時大會派，却也向

我們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好地分成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民衆威迫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塞維克也許還未商量妥當。（列寧：兩個策略）

現在我們獨秀同志對於中東路問題也向我們提議：（一）指出戰爭的危險，（二）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三）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四）……關於第四階段是不是『擁護蘇聯』，我們的獨秀同志或許也還未考慮妥當。這是與先宣傳，後組織，然後鬥爭，暴動，一個模型製造出來的機械的階段論，或者『曲線論』的少數派的觀念。

『凡一個政黨的策略，即是這一個政黨的政治行爲，或其政治動作的性質，趨向及方法。決定一個策略，即所以確定黨的政治行爲，嚴格的規定整個黨對於新發生的職任，或新的政治狀況的態度』（列寧：兩個策略）

所以黨對於某一問題的策略，必須與黨對於這一問題的職任和態度相適合，固然列寧主義的策略，應當是能適應環境，伸縮自由的，可是這種伸縮自由的性質，決不可以與黨對於本問題的職任和態度相違反或「不同」，這是決定策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列寧主義的每一個策略都是爲着取得廣大羣衆（本階級的和客觀上的同盟者）的擁護，動員廣大羣衆向統治階級進攻，可是無論甚麼時候，甚麼形式裏，這一策略的提出都要能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提高一般羣衆的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線。決不能爲着取得廣大羣衆，而降低無產階級的口號到一般落後羣衆的水平線。如果這樣便不是取得羣衆，更不是領導羣衆，而是跟着落後羣衆的意識跑，做羣衆的尾巴，這是決定策略的第二個基本條件。如果不注意這些條件，那麼就會喪失策略上的革命性和階級性；因此一方面會發生左傾的幼稚病，別方面會發生策略上的機會主義，妥協主義，以至於背叛革命。

現在黨內對中東路問題的兩個極端的偏向，首先自然都是原則上的錯誤，同時

也都是不瞭解這些決定策略的條件。托洛斯基主義者不認識這些條件，走到極左的方面，只提出『爲世界革命而擁護蘇聯』的口號，不要『爲中國民族解放而擁護蘇聯』的口號。我們的獨秀同志因爲不瞭解這些條件，走到極右的機會主義方面，主張不要，成者暫時不要『擁護蘇聯』的口號，而提出他的資產階級左派的『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

獨秀同志不瞭解策略上的妥協與降低無產階級的政治口號是絕對不同的；爲着革命的階級策略的利益，而暫時取某種的讓步，這是合於列甯主義的原則，但是降低無產階級政治的口號，這是列甯不止一次的毫不容情的指斥少數派這樣的機會主義。獨秀同志因爲不瞭解這一點，所以拿列甯對布勒斯特和約的讓步，來證實他的機會主義的策略的『曲線論』。爲甚麼獨秀同志不仔細去瞭解當時列甯雖然暫時對德帝國主義讓步，但是一點也沒有降低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而且相反的，列甯正是爲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而暫時讓步。獨秀同志拿列甯對布勒

斯特和約的暫時讓步，來掩釋他的降低無產階級的政治口號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充分證明他對於列寧主義的誤解。

三、『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與『擁護幫助民族解放的蘇聯』，表面上都是站在民族觀點上的口號，實際上一個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一個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口號。現在的『國』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國』，而不是中國大多數民衆的『國』。無產階級認爲必須推翻現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建立大多數民衆（工農勞苦羣衆）的『國』，然後中國民族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所以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主張，驅逐帝國主義必須與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聯繫起來。資產階級左派的利益是要擁護現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國』，但是不滿意現在統治的派別，所以常常攻擊現在的統治者『誤國』，或者是『遺誤黨國』。（第三黨常常罵蔣介石誤國，而改組派常常罵蔣介石遺誤黨國，這是因爲改組派是國民黨的一派，而第三黨却自以爲是國民黨黨外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堅決的反對統治階級爲着階

級的利益出賣整個民族利益（賣國），但是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能走到承認現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觀點，而罵他們『誤國』。並且『賣國』是有必須絕對的反對的意義，而『誤國』，只是相對的攻擊的意義（就是還有改良的餘地）。所以『誤國』只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名詞，而『賣國』却是被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站在擁護民族利益的觀點時候，也可以應用。不過沒有說明的單純的提出『反對賣國』，還是可以使羣衆模糊。所以『誤國政策』與『擁護蘇俄』不止是形式上的不同，而且是根本政治意義的不同。

中央只指出『誤國政策』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並沒有說『賣國』也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名詞，獨秀同志的第二次信上故意把『誤國』與『賣國』聯做一塊來說。在獨秀同志的第一信上對於他的『得意之作』的『誤國政策』，特別注明『更能使羣衆親切瞭解』，可見他特別重視這一口號，而在第二信上却不把『誤國』特別解釋，而只與賣國聯做一塊囫圇吞棗的敷衍過去，這只是一種狡辯的把戲，而不

是討論策略的正確的態度。

「擁護蘇聯」的口號，不止是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壓迫民族所必需」（來信上的話），中央特別注意現在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廣大羣衆的強烈的民族觀念，正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動力，所以中央無論在宣言上，通告上，機關報的言論上，都特別看重解釋「擁護蘇聯」的口號在民族方面的意義。不過僅只這樣是不夠的，一定要同時解釋這一口號在階級利益上的意義，然後才能使廣大羣衆瞭解，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利益，與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不只是不相衝突而且是不可分離的。獨秀同志既然瞭解了「擁護蘇聯是被壓迫民族所必需」，又讀過了中央的宣言，通告和各種刊物文件，却又攻擊中央只是站在階級利益上的宣傳對於羣衆的民族觀念「缺少戒心和注意」，難道中央特別着重「擁護蘇聯」口號在民族方面的解釋，是沒有「戒心和注意」，一定要墮落到資產階級觀點的泥坑，提出「誤國政策」的口號，才算是「戒心和注意」嗎？難道要取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

羣衆不是要把這些羣衆的觀念，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線而是要跟着落後的羣衆的意識跑嗎？獨秀同志的中心錯誤就在這裏，他只知道要『注意』一般羣衆的民族觀念，而不知道要使廣大羣衆脫離資產階級欺騙的民族觀念，提高到無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思想的水平線。這只是對於羣衆的民族觀念的懼怕，因而使自己墮落到資產階級的行列，而不是領導羣衆的民族觀念去接近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思想。懼怕羣衆的落後的觀念因而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使自己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泥坑，這是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病根。

「擁護蘇聯」，無論在階級觀點上，民族觀點上，都是必須的口號，所以中央並沒有不注意羣衆的民族觀念。獨秀同志卻想取消「擁護蘇聯」的口號，拿「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他，正是獨秀同志拋棄了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主義不要站在民族觀點上的宣傳，獨秀同志不要站在階級觀點上的宣傳，在策略的意義上說，這正是機會主義的兩方面。

四、「羣衆對於政治的瞭解，主要是靠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單只我們的宣傳煽動是不夠的」（見列甯左派幼稚病）。蘇聯首先放棄在中國的特權，蘇聯在中國大革命中用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革命，幫助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一開始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屠殺工農的時候，便實行與蘇聯絕交，這難道不是羣衆的政治經驗，而是「主觀的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的表現」嗎？現在上海的工人羣衆，以至廣東福建的農民羣衆說「蘇聯是打抱不平的」，這不是偶然的，正是羣衆在自己過去鬥爭的經驗得來的認識。所謂「蘇聯是打抱不平的」，正是「蘇聯是中國革命的好朋友」的意義。至於「誤國政策」，只就字面上已經不是一般工農羣衆所能瞭解，而只是一般聽慣了「遺誤黨國」的資產階級的人們懂得，至於他的含義上要經過「曲線」的解釋才到本題，更使一般工農勞苦羣衆莫明其妙。一個是工農勞苦羣衆易爲懂得的口號，一個是資產階級的人們易爲懂得的口號；一個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口號，一個是資產階級的改良的口號，我們到底應該採用那一個？

或者是不是兩個可以同時并用？固然國民黨正在極力擴大他的欺騙的民族宣傳，想來模糊羣衆明確的認識，固然『現在廣大的羣衆還有民族的偏見，國民黨的宣傳有很大的影響』，這正是需要我們加倍的努力去擴大這一口號的宣傳，使羣衆在過去鬥爭中有了這樣認識的基礎上更加明白起來。固然這一口號只能動員『革命的羣衆』，這正是需要我們自己並動員革命羣衆向落後羣衆去解釋，吸引他們到革命的戰線上來，決不應當採取落後羣衆的口號，而使革命羣衆墮落到落後羣衆的水平線。我們決定策略，提出口號，應當首先注意『革命的羣衆』，而不應當首先注意落後的羣衆，尤不應當只看見落後的羣衆而不看見革命的羣衆。中央注意了革命的羣衆，同時注意了落後的羣衆，所以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同時特別着重這一口號在民族方面的解釋，獨秀同志只看見落後的羣衆，而忘記了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的羣衆，所以主張取消『擁護蘇聯』的口號，而用他的資產階級的左派的口號『誤國政策』來代替，這就是中央與獨秀同志的不同。

獨秀同志在第二次信上不止一次的申明，「擁護蘇聯」的口號，原則是對的，『我並不反對這一口號』，只是覺得這一口號不夠，同時要提出『誤國政策』的口號，才能使羣衆親切瞭解（同時又沒有承認他在第一次信中不要『擁護蘇聯』口號的錯誤，並且沒有承認擁護蘇聯應該是中心口號，可見他是故意的模糊同志的觀念）。固然黨對某一問題的策略，爲着要動員更廣大的羣衆起見，除了根據黨對這一問題的職任與態度提出中心口號在羣衆中作廣大的宣傳外，同時還要提出許多羣衆切身利害的附屬口號，來幫助這一中心口號更能深入羣衆。但是這些附屬的口號，必須在政治意義上不與中心口號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號的意義。

譬如號召五卅示威運動，『驅逐帝國主義』是我們中心口號之一，因此我們的附屬口號，提出『反對屠殺張學良』，『驅逐外國海陸軍』等，因爲這些口號與中心口號一點矛盾也沒有，而且可以幫助中心口號更能深入羣衆。可是決不能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來做附屬的口號，因爲『修改不平等條約』是降低了『驅逐帝國

主義』中心口號的政治意義。所以對中東路問題，中央提出『擁護蘇聯』的中心口號之外，同時提出『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反對帝國主義共管中東路，反對資本家利用白俄壓迫自來水工人』……等（參看中央通告），這些口號不但不與『擁護蘇聯』相矛盾，而且可以幫助『擁護蘇聯』口號的深入。假如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來做附屬口號，便是很明顯的降低了中心口號『擁護蘇聯』的政治意義。所以把『誤國政策』與『擁護蘇聯』同時並用，也是一樣的錯誤。

獨秀同志看見上海兩次的示威參加的羣衆還不廣大，以爲就證明了中央的『誇大』，就是中央策略錯誤的結果。然則採用了『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就能動員羣衆嗎？果然這樣，爲什麼改組派第三黨老早採用了這樣的口號（請獨秀同志去讀一讀中華革命黨對中東路問題的宣言和改組派的機關報民主），並沒有看見廣大的羣衆在他們口號之下行動起來呢？不是的，決不是的，羣衆瞭解了這一口號，還要加上羣衆主觀上鬥爭的勇氣和客觀上統治階級鎮壓力量的削弱，然後廣大羣

衆才更能在這一口號之下積極的行動起來。現在廣大羣衆其所以沒有更能積極的爲這一口號而鬥爭，就是因爲羣衆鬥爭的勇氣還沒有高漲，和統治階級白色恐怖慘酷的鎮壓，再加上我們的宣傳還沒有十分深入的原因。譬如『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獨秀同志總不會否認是廣大羣衆所不能瞭解的吧？爲什麼廣大羣衆還沒有爲這一口號而鬥爭起來呢？是不是看見廣大羣衆還沒有爲這一口號來積極鬥爭，便懷疑是這一口號的錯誤，而主張拿出小資產階級更能懂得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口號來代替他呢？恐怕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是這樣想吧！假如有人說明，這不是策略的不對，而是客觀的白色恐怖的壓迫，羣衆鬥爭的勇氣尚未高漲，和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十分深入的原因，便罵他是『機會主義者把自己主觀上的錯誤，推到客觀上的老法子』，恐怕只有真正的機會主義者企圖攻擊黨的正確路線的時候，才會這樣的無的放矢吧！並且二十六與八一兩次示威，都有千數以上和幾千羣衆的參加，這難道不是建築在羣衆的自覺上，而是黨的命令主義命令來的嗎？難道不

建築在羣衆的自覺上，由黨的命令可以使羣衆赤手空拳的去與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槍砲拚命嗎？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是這樣的侮辱羣衆，不相信羣衆。至於說用我們的口舌去宣傳羣衆，用羣衆的行動去影響羣衆，這就是『命令主義』；組織羣衆的鬥爭與示威游行就是『盲動主義』，無異說現在是研究的時候，『讓羣衆起來了再幹吧！』，這是不是十足的機會主義？

五、獨秀同志兩次來信上，非階級觀點的分析方法與他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的主要點，在上面已經有充分的說明，至於他的來信上故意造謠斷章取義的對中央的攻擊（如說中央『只要站在階級利益的宣傳』，『只是爲有害於無產階級的蘇聯而反對』）用不着詳舉事實來做反證，只要細閱中央一切的文件，便可知道。尤其是一些字句上的荒謬，更用不着逐字逐句的批評。但是他在來信上的最後歸納爲八個問題，現在也把上面的意思歸納起來作一答覆：

一、每個原則，是否可以機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略上的變化？

每一個策略必須與黨從原則上決定的職任與態度相適合，雖然應該有伸縮的自由，但決不能與原則相違反或『不同』。與原則相違反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與少數派的策略過程階段論一樣的『曲線論』的策略，便是機會主義的觀念。

二、中國此時是否有許多羣衆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有。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口號才能使他們在這些『偏見』和『欺騙』之下解放出來，如果拿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只能助長這些『偏見』和『欺騙』；並且這就是懼怕羣衆的民族觀念，而使自己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泥坑，正是機會主義的病根。

三、在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上（關於中東路問題）除了牠勾結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外，是否還要說到牠這樣的反革命（或許是誤國的誤寫罷？）的政策，對

於中國有怎樣的結果？

一定要有詳細的說明，但是主要要指出進攻蘇聯同時就是鎮壓中國的革命，說明『戰爭』的危害還是次要點。尤其是把進攻蘇聯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是中東路問題兩個平列的可能前途，同時又不說明兩個戰爭的不同意義，只是籠統的說『戰爭災禍來了』，這不只是迷亂了羣衆對於主要危險的認識，而且可以做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理論基礎，甚至可以被資產階級利用去反對蘇聯。（參閱紅旗第三十七期中央答覆獨秀同志的信）

四、中國廣大羣衆是否都已經認識了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凡參加過中國大革命鬥爭的羣衆，的確在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中，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但這並不是說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欺騙宣傳所能動搖，而不需要我們揭露資產階級欺騙的努力了。

五、對於中東路問題的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們主觀的而是羣

衆所能親切瞭解的解釋？

非常之需要，所以我們要着重在『擁護蘇聯』口號的民族革命方面的意義的解釋，羣衆有了過去的政治經驗，很有可能親切瞭解這樣的意義，這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至於『誤國政策』的口號只有聽慣了『遺誤黨國』的資產階級的人們所能瞭解，決不是工農勞苦羣衆所能瞭解。

六、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羣衆，是否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我們階級的口號？

『擁護蘇聯』不只是階級的利益而且是民族的利益，所以不只是無產階級能接受，而且是一般羣衆所能接受。

七、對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羣衆，我們應否一概不要？

我們是要拿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口號去征取他，如果是去跟着他們的落後的意識跑，便是變成了羣衆的尾巴，而不是領導羣衆。

八、除開階級口號之外，是否還應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號，能夠喚起廣大羣衆參加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

當然，除了中心口號之外，還要有許多使羣衆更感着切身利害的附屬口號去發動羣衆。但是這些附屬口號，決不能在政治的意義上與中心口號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號的政治意義。『誤國政策』便是降低了『擁護蘇聯』口號的政治意義。

總括上面的說明，很明顯的有兩個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中央站在階級的觀點上分析中東路問題主要的危險是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戰爭，因此中央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征取廣大的羣衆到無產階級民族革命思想的水平線；獨秀同志分析中東路問題，認爲進攻蘇聯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個平列的前途，又不明白向羣衆指出兩個戰爭的不同意義而空喊『戰爭災禍』，同時懼怕羣衆的民族觀念，因此提出『誤國政策』的口號，使無產階級政黨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泥坑。很明

顯的一個是列寧主義的路綫，一個是機會主義的路綫。獨秀同志站在他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上，因此覺得中央的正確的路綫是盲動主義。凡屬懷疑或不願意接受列寧主義的路綫的，毫無疑問的不走入極左的幼稚病，便要走入更深的機會主義，這就是獨秀同志直到現在還不能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脫離出來的原因，希望獨秀同志對於這一點要有深刻的自覺。

中央黨報委員會

八，三十。

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

中央常委同志們：

現在關於時局之當面的危機，無過於中東路問題，這一問題不是簡單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是國際糾紛問題之導火線。由這導火線而至爆發戰爭，也許是慢性的（因為中俄都不利於輕率開戰，尤其是帝國主義間都還未曾充分準備好，現在誰都不敢斷然取獨佔的形式，會需要經過一些曲線的鬥爭。），然除了恢復中東路原有的狀態即中俄共管形式，國際糾紛是要繼續發展的。

這種糾紛發展到爆發戰爭，有兩種可能形勢：一是蘇俄始終取強硬政策，帝國主義者必然在援助中國名義之下，共同向蘇聯進攻，不但在遠東，近東也是一樣；一是蘇俄若取退讓政策，帝國主義者之間必然因互奪中東路遲早要導入第二次大戰。無論是那一種，都要在中國做戰場，把中國做成塞爾維亞，在戰爭中最受直接

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

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衆，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羣衆，甚至有許多勞動羣衆也受了欺騙，或者在受了欺騙而迷惑的嚴重空氣之下，不敢別持異議。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此事在中國發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國社會有直接利害關係，民衆多數心理又是這樣，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衆同情，這些實際情形，都不能讓我們閉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進的。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的宣傳方法，似乎不能像別國的兄弟黨那樣簡單，即是說單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夠解答羣衆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實際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們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羣衆了，也太單調了，對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體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蘇聯在中國的權利，僅只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

，唯一原因是因爲中東路是進攻蘇聯之一個有力的軍事根據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這句話，顯然有幾層語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發點，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羣衆的中心口號；而未曾詳細指出：在未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自己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此時中國大多數民衆，尙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這一層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使他們在實際利害上權衡一下，他們明白了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在此時的確是有害無利的幻想，他們才能夠瞭解蘇俄和帝國主義不同，才能夠瞭解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才能夠瞭解蘇俄是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領導者。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羣衆，反而使羣衆誤會我們只是虛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並且使國民黨很便當的簡單明瞭的把他們「擁護中國」的口號和我們「擁護蘇俄」的口號對立起來，聽羣衆自己選擇一個。

第四十二號中央通告說：『并且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樣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這只是在客觀上也許會演成事實，但我們根本上反對一切反動的國際戰爭的黨，尤其是正當極力動員羣衆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緊急關頭，決不應該向同志這樣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罷！』因此，我主張中央趕快補發一通告，取銷這幾句話。

我估料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發言引起大家的誤會與揣測，所以我以後對於重要問題，都想有點意見貢獻於黨；并且希望能夠把我的意見全文都在黨報上發表出來。此致

革命的敬禮！

獨 秀 七月二十八日

獨秀同志覆中央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們：

讀了你們八月四日對於我論中東路問題宣傳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覺得你們對於我的意見根本不曾瞭解，因為是關係黨的宣傳策略之重要問題，不得不再向你們剴切的重複說明一下，這是我對於黨的責任。

我們要懂得和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複雜的錯綜的全部理論與政策，首先要懂得辯證法的時間與空間之變化性；資產階級的學者不懂得這個，所以往往拿他們自己的形式邏輯之『不容間位律』來攻擊馬克思和列甯，說他們是詭辯派；有些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因為不懂得這個，才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并且還不是替黨起草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部宣傳大綱，也不



是討論中央對於這一問題的宣傳原則，而是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此外你們已有的話，當然不用再重複加上一些贅詞了。你們對於我的前信不瞭解，有許多是由於這一點。

原則是一定不變的，此所以謂之原則；至於策略戰略，則因有複雜的時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時時事事都必須照着原則機械的死板的應用不能有一點變化性；有時因為在時空性上有需要經過曲線才能達到革命之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式不同的策略。我們若不懂得這一點，就會責備列甯布勒斯特和約的政策，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是『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發生策略上的不同』；因為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在形式上顯然違背了『不和資本帝國主義妥協』的原則。像這一類的『矛盾』政策，充滿了列甯一生革命的全活動；此所以列甯被稱爲『政策上的辯證論者』，此所以列甯罵反對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個雞尙能跳出人畫的白粉圈』。我們若只是拿幾個原則甚至幾個名詞，以爲這就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未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看得太淺薄了，我們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們的來信把策略和原則混爲一談，這不是偶然的錯誤，乃是『你們的原則』之錯誤。你們的原則，是原則和策略不分，以爲策略必須是原則的腳象，所以在一切宣傳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幾個原則機械的呆板的用命令主義蠻幹，而不知道對於各種各樣複雜的問題有時間空間性不同的活的策略運用之必要；這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任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在原則上，『擁護蘇聯』這一口號，不僅是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壓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對這一口號的宣傳；反之，我却以爲我們以前宣傳這一口號太不充分。至於在策略上戰略上，這一口號應用到夾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這個特殊事件，爲爭取廣大羣衆計，便要小心，單是這個口號便不夠了。並不是說對羣衆解釋因收回中東路而必然發生的危險和國民黨的賣國政策之後，而不歸結到反對

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擁護蘇聯，而是說必須對中東路問題本身有了正確的詳細的解釋，把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後我們的口號才能發生比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說：『對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體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只是」拿擁護蘇聯做動員羣衆的中心口號』，則『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羣衆』；這是因爲有許多羣衆還在小資產階級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迷惑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或者你們以爲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黨，不是『資產階級的左派』，對於中東路問題，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向羣衆宣傳，對於其中夾雜的民族問題，不需要我們有什麼正確的詳細的解釋，使羣衆的觀念模糊了；並且你們很肯定的說：『實際上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廣大羣衆……都在自己實際鬥爭的經驗中瞭解了這一事實』。這是你們完全忘記了列寧曾說過：『落後國家的小農經濟，族長制度，愛鄉的觀念，根深蒂固，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即民族自我主義和民族的排外心

，必然熱烈的存在着。這種偏見，必須先進國之資本主義根絕了，後進國之經濟生活的全基礎都根本改變以後，方能消滅；消滅這種偏見，決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國階級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長期間被壓迫的國家與民族裡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見，應與以特別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提案）這是你們還沒有真能深切的瞭解；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有自己階級以外的羣衆，最革命的以至比較落後的廣大羣衆之擁護，才能夠成功。你們說：『不應跟着羣衆的落後意識跑』，這是對的。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羣衆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羣衆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羣衆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在我們領導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照你們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戰略，固然不是跟着羣衆跑，却也不能夠爭取羣衆，而是脫離了羣衆。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若是脫離了羣衆，便成爲只是口頭上紙面上的布爾塞維克了。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實際是個幻想；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也實際是假面

具；用收回中東路的名義而開始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的戰爭，或弄起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以及戰爭中加於中國民衆的災難，也都是實際可能的前途；怎見得這是「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羣衆」呢？又怎見得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呢？前一個是反革命勢力對革命勢力的戰爭，後一個雙方都是反革命者犧牲下層羣衆爲上層階級爭權利的戰爭，我們能不反對那一個？只有反對一切戰爭（不論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若慮同時反對兩種戰爭，羣衆對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這一戰爭，會把蘇聯和帝國主義的國家常做兩個交戰團體，平等看待，『雙方都要打倒』；則當然應該如你們所說：『帝國主義戰爭是反革命的勢力內部的戰爭，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反革命勢力進改革命勢力的戰爭，我們須公開的明白的把這一分別告訴廣大羣衆，然後羣衆才能知道對付這樣兩種不同的戰爭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羣衆還何至誤會？并且，我還要問：『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

爭』這一口號，其涵義是些什麼？爲什麼不說『反對俄日戰爭』或『反對俄美俄英戰爭』，而說『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這是否已經明白表示對兩方的敵與友的態度？『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俄的戰爭』和『反對英美戰爭或日美戰爭』，已有顯然不同的意義；何況還有在這些口號之下不同的詳細宣傳，何至使羣衆誤會？

單就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向無產階級的蘇聯進攻這一點說，不但在本質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顯的是階級衝突，這是任何同志都無需解釋而能夠懂得的；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釋的話再向中央解釋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說話，目的是在說明由中東路問題將引起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而不是說明其性質。我所以要說明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是因爲我對於中東路問題的發生原因及發展前途之客觀的觀察，都不像你們主觀上的那樣簡單。美國對於北滿的野心，有他的經濟基礎和長遠的歷史，近來正在企圖以共管名義攫取中東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東路，自然感覺着中東路落到美國手裏比暫時留在蘇聯手裏對於他更是

不利；所以除了把中東路仍舊回復中俄共管的原狀，這兩個帝國主義對於此路的競爭，必日益加劇，雖然他們對付蘇聯之目標是一致的。并且在總的國際局勢上，帝國主義間尤其是英美兩個領袖的帝國主義之間，由他們經濟上之生死存亡而難以久延的戰爭，和他們向蘇聯進攻的戰爭，是同樣的嚴重；這兩種戰爭那一種先行實現，誰也不能機械的肯定像你們肯定蔣桂戰爭不會即來那樣，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兩種戰爭發展的前途，都同樣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東路問題的時空性而論，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固然應該告訴羣衆，同時帝國主義之間因互奪中東路而戰爭的危險，也不能不告訴羣衆；這是因爲：第一，若是我們隱瞞了這一可能的事實，一旦局勢轉變，羣衆所眼見的戰爭，不是向蘇聯進攻而是帝國主義互鬥，他們不是感覺到我們的指導不正確或欺騙了他們，便是以爲帝國主義的互鬥於中國人沒有什麼危險；第二，指出帝國主義會因互奪中東路而戰爭的危險，不但沒有迷亂羣衆對於進攻蘇聯危險的認識，而這樣正是暴露了

帝國主義所以要進攻蘇聯之秘密（當然，帝國主義的根本目的還不在此，這裏可不必說），也正是暴露了國民黨仰承帝國主義意旨收回中東路進攻蘇聯之真實的賣國罪證。

你們以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那末，七月十二日黨的宣言，也攻擊國民黨『賣國外交』及『賣國勾當』，難道這也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嗎？絕對不是的；因為我們總的政策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決不能單拿這一方面的話來指摘黨離開了階級的觀點。所謂資產階級的左派如汪精衛等，也會拿這樣的話攻擊南京政府；可是我們要問：他們總的政策是些什麼？他們用這樣的話是否爲了要打碎他們的國民黨擁護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達到動員羣衆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之目的？如有這樣的目的，他們已經離開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了，因爲全世界都找不着這樣左的資產階級。我們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的意見，以爲現在的無產階級字典上已經不應有『國際』『國家

「這類的字，有用這類字的人，『就是離開了階級的觀點』，『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觀點』。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大聲攻擊沙皇及克倫斯基政府因戰爭『把國家及資本主義弄到未曾有的荒廢』。如果我們不懂得列寧這句話有戰略上複雜的時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階級利益的口號外，還需要這類廣泛的宣傳，才能動員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羣衆，來擁護無產階級革命。），也會曲解誣衊他是降低口號，是國家主義觀點，並且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者你們以為這種資產階級的口號，在國民黨政府參加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時，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在國民黨政府參加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時，我們便只能用擁護蘇聯的口號。其實如果我們認定某一口號應該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完全是為他們階級的利益的，即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也不能用；至於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中，也不能說『只能』用擁護蘇聯的口號。這一口號，不是在原則上對不對的問題，而是在策略上夠不夠的問題。『只是』這一口號，實際應用起來到底夠不夠，最近幾次我們號召的示威運動已經明白

的回答了我們，不能再用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了；你們如果仍不覺悟，老是拿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同志們不接受欺騙發生反感，則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們接受了欺騙，以爲我們已經有如何的力量，則去刻苦工作爭取羣衆的精神才遠，這也不是個小小的問題，至於你們把羣衆沒有在你們提出的口號之下起來的原因，歸到白色恐怖，這乃是機會主義者把自己主觀上錯誤的責任推到客觀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爲這一戰爭有害於無產階級的蘇聯而反對，同時不提及這一戰爭也如何加害於中國人民，不能使一般羣衆都真實感覺到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聯系，只是爲無產階級而擁護無產階級，爲蘇聯而擁護蘇聯，則『擁護蘇聯』這一口號只能動員蘇聯及各國（中國也在內）的無產階級，而不能動員中國的廣大羣衆。『擁護蘇聯就是擁護中國革命』，也只能動員中國沒有小資產階級偏見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動員多數比較意識落後的革命羣衆。你們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方法之缺點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們所提出的口號，在原則上自然不錯；可

是在策略上即宣傳方法上，便大大的成爲問題。問題就是『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則能動員無產階級的最覺悟分子；同時對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確的詳細的解釋，使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羣衆尤其是比較落後的羣衆，明白自己的幻想與國民黨賣國誤國的罪惡，而接受我們的動員口號。你們這樣大成問題的戰略，乃是建設在『廣大羣衆都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這一前提上面；這正是你們素來『以主觀爲客觀』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帝國主義戰爭會引起革命，這是對革命發展前途的估量；正在號召羣衆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同時『告訴羣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中國革命有利的條件』，終非時空性所許。

前言所謂『因我的發言引起大的誤會與揣測』，乃是恐怕增加黨的糾紛，并不是由個人出發而隱藏自己的意見。

以上的說話，似乎稍複雜了，爲使同志明瞭我主要的意思起見，再簡單的重說

幾句，做一個總結。我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陳述關於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之全部內容，也不是討論此次宣傳的原則問題，而是覺得中央對於中東路問題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 未曾用羣衆所能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羣衆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爲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 『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羣衆，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羣衆，把這些廣大羣衆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我爲什麼要提出這兩點，因爲我們的黨應該是實際鬥爭的黨，不能忽視下列的各實際問題：

一、每個原則是否都可以機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略上的變化？

二、中國此時是否有許多羣衆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三、在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上（關於中東路問題的），除了牠勾結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外，是否還要說到牠這樣反革命的政策，對於中國有怎樣的結果？

四、中國的廣大羣衆是否都已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五、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們主觀的而是羣衆所能親切瞭解的解釋？

六、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羣衆，是否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我們階級的口號？

七、對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羣衆，我們應否一概不要？

八、除階級的口號外，是否還應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號，能夠喚起廣大羣衆，參加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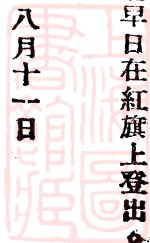
我希望這封信和前幾天論黨內各種問題的那封長信，都能早日在紅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的敬禮！

獨秀

八月十一日



獨秀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

央信

中央常委同志們：

一 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這是大家都知道了。這個錯誤的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根由，乃是因爲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我們若不深刻的瞭解這個根由，將仍要輾轉陷於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將只是口中反對機會主義這一名詞，而手中所做的仍舊是各種各樣變相的機會主義。

『八七』會議以後，僅僅是籠統的反對機會主義，並未曾指出機會主義政策發

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實際情形，勇敢的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些既成的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我們分明是失敗了，當時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戰鬥力，即是我們從戰場上退出來，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以圖革命之再起。當時黨的政策却不是這樣，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直到六次大會前尚在進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使敵人得着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把我們整個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無產階級及農民羣衆，在黨的『暴動！暴動！繼續暴動！』這樣命令之下，受了一時不能回復的損傷，黨中最積極的戰士亦因之喪失殆盡，黨和羣衆也斷了聯繫，至今還不易恢復。

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羣衆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羣衆的

聯繫；若不馬上改變政策，從羣衆自身的日常生活鬥爭中獲得廣大的羣衆，若不估計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情緒到了若何程度，而隨便暴動，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羣衆更加離開我們，甚至於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動派的宣傳。當時的中央對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聽說在六次大會時，特立對布哈林說：『盲動主義極盛時，我實覺得不妥當，但在中央高壓之下，不敢說出不
同的意見。』的確，當時的中央同志們，以爲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者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主義，只有暴動才是布爾塞維克的正確路線，如有人對於革命高潮有點懷疑，對暴動有點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打擊，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氣概。幸而六次大會對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對於機會主義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可惜太晚了，並且未曾把這些錯誤之根由系統的澈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

二 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這些錯誤呢？我以爲一點也沒有改

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根本上也同時存在。始終不認識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危險，始終不認識統治階級即國民黨政權之階級性，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與資產階級之勝利，始終不認識現在是列甯所謂『革命二個波間過渡期』，則在政治分析與估量上自然要發生錯誤。政治上有了錯誤的估量，即是把敵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壞，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發生盲動主義；盲動主義者碰着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黨內德謨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證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來說』。這是造謠，中央正反對認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意見，參閱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與覆江蘇省委同志的信（編者。）及盲動路線之正確。有許多同志都感覺着中央在政策上組織上或工作方法上，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我以爲不是這樣零碎的問題，而是有系統的一貫的總的路線之錯誤。若長此照這樣不正確的路線蠻幹下去

，於革命及黨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又只得不避忌諱，向你們詳細說明一下：

三 你們對於蔣桂戰爭性質分析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於不會洞察資產階級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不瞭解統治階級即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這種傳統的錯誤這種整個的錯誤觀念所表現之一例。把國民黨看做是一種各階級的政治聯盟，而不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這本是我們黨傳統的錯誤；由這傳統的錯誤觀念做出發點，所以你們才把蔣桂戰爭及一切國民黨內部鬥爭，都當做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之爆發。（你們把蔣桂戰爭看得如此嚴重，如此誇大，所以一直到戰爭爆發之前一分鐘，尙堅決的預言戰爭不會就爆發；這個錯誤決不是偶然的，代他們格外誇大，遂不得不代他們格外慎重。）

其實，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

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早已成了牠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的（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共同必要；至於說資產階級企圖發達市場，列甯曾經告訴我們，這是要靠『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與發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第一，為生產手段創造市場，即是富農把他們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農民身上搜集的生產手段轉化為資本；第二，由購買能力較強的農民消費擴大，以創造市場』。若改良一般農民生活，增高一般（這裏連工人也包含在內）購買能力，則非資本主義生產力終於不能有高度發展的中國資產階級所需要與可能（國民黨政府絲毫也沒有想到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正因為現在沒有這個需要與可能）。此外，這兩個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還有甚麼呢？而且，中國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

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牠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牠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牠爲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牠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牠們所以現在尙能殘存，乃因爲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並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來形成以自己爲中心爲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

你們忽視了這些很明顯的事實，遂至今還是過分估量封建勢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負責同志日前和我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竟說：「此時中

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謠，中央只是說中國是農業落後國，農業生產還超過城市生產。在發展的方向上，當然是城市支配農村，這裏沒有爭論，但農村總是比較城市落後，絕不能將中國農村看得如上海漢口一樣——編者。）

像這樣不正確的觀察，自然會幻想中國尚有這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封建與資本）戰爭之可能，自然會產生「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這是曲解，中央在反對嚮導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時候，指出每個戰爭每個政治事變都有他的經濟的背景與階級的意義。參閱中央通告第十五號，三十四號等——編者）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只可說每個戰爭都有經濟的背景，在階級的社會裏，便有階級的意義（這裏所謂階級的意義，如就階級內部戰爭說，是和個人的意義及其他意義相對立，不是和階級戰爭之涵義完全相同；因為每個階級戰爭，必須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之革命戰爭），不能說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戰爭。這是因為未有階級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戰爭；已有階級的社會裏，各階級內部也有戰

爭，最顯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戰爭，中國的北洋軍閥戰爭，南北美戰爭。

如蔣桂戰爭真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戰爭，蔣介石討發桂系，如果真如你們所說是『爲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而要『相當的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三十號通告）不得不和你們所謂『更反動的』『尚有強固基礎』的封建勢力戰爭；那末，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還未完全喪失其革命性，我們便不應該而且也不能夠號召羣衆起來反對這種戰爭，因爲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這些也都是羣衆所要的。三十四號中央通告所謂：『同志中有以爲「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戰爭，也就是民主勢力反封建勢力的戰爭，並且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之這次戰爭在客觀上是有革命的意義」。這是一個極端右傾的危險觀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擁護蔣介石的路線上去』。這些同志對於蔣桂戰爭性質所下的定義，和中央自己所說的一樣，這一個極端右傾的危險觀念與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錯誤的分析之必然的結論，如何能夠歸

答於同志！於是你們又解釋道：『階級戰爭不一定是革命的』（許多同志都說中央有這樣的解釋），（中央只說中國的軍閥戰爭雖然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可是主力的動力是帝國主義，所以沒有一點革命或進步的意義——編者）；如果真是這樣，則馬克思主義及無產階級的戰略基礎，便根本倒台！『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及『階級戰爭不一定是革命的』這兩個理論，都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加了聞所未聞的修正，顯然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四 蔣，桂戰爭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對於他及一切國民黨內部戰爭，究竟取什麼態度呢？我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正在很複雜的流變生長過程中，和歐洲已經能夠和平發展而且已有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不同，牠們的階級來源太複雜，又加以帝國主義之操縱，牠們內部各派之間，政權及地盤的明爭暗鬥，以至爆發戰爭，這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較長期的現象，蔣桂戰爭，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新政權之內部衝突，而和國民黨從前對北方封建軍閥戰爭有不同的性

質。不但代表複雜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之國民黨是如此，即在歐美先進的資產階級，牠們當中，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輕工業和重工業及財政資本之間，雖然很少國內戰爭，而衝突仍然不斷，這一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那一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更有大的衝突。無產階級對於牠們的態度，只是分析出牠們之間的衝突，是爲了經濟上或政治上某種具體問題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們只有利用牠們之間每個衝突（不管牠是經濟的或政治的），來擴大自己的運動，對於他們之間因利益不同而爆發的每個戰爭（不管牠是大規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號召羣衆起來反對，不但是消極的反對，且須積極的轉爲階級戰爭，此時不需要代他們分別那個是純資產階級的，那個是帶封建性的；或者那個較進步較左些，那個更反動些，那個還有改良政策的企圖或欺騙，那個連這些都沒有；因爲這決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當面的任務是推翻整個反革命勢力之統治，因爲我們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立腳點上，對於他們之間已經不能有不同的戰略。

對於牠們之間採用不同的戰略者，例如從前俄國的少數派；少數派總以爲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比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進步些，沙皇更反動些，牠們之間的確還有衝突，無產階級就該和資產階級聯盟掃除更反動更有強固基礎的封建勢力。

多數派堅決的回答說：否。牠們對我們已經是整個的了，我們對牠們也必須是整個的。『我們正在反對封建，你們不要反對我們！』這是民主立憲黨所要的；少數黨居然做了牠的應聲蟲，多數派則斷然拒絕之。『對桂戰爭是反封建勢力』，這是蔣介石爪牙的宣傳，我們共產黨中央也這樣說，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爲不曾洞察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不曾看出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發展對於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我們黨在土地革命綱中，對於富農取了猶豫態度。列甯說：『農民社會之分解，是爲資本主義創造國內市場。』『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與發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富農中農及農業無產階級』）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農村發展之初步形式，牠對於下層羣衆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資

產階級取一致態度；是因爲富裕的農民，蓄有餘資的以營利爲目的而購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較多的雇農，生產商品，出賣於市場；或於農業之外兼營商業；或放高利貸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經走進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下層羣衆（貧農）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經過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後，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下層羣衆起來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貸，富農反對革命是不會有絲毫猶豫的。

每個革命鬥爭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會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給予的利益不同而發生向背；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與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中農是中間動搖分子，富農是反革命者，因爲牠所失於革命的農民的東西比所失於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終想和富農聯盟來反對地主，和始終想和資產階級聯盟來反對帝國主義，是同樣的機會主義。

並且中國的農民革命，不是簡單的反對封建地主問題，中國的地主階級中，根本就沒有像法國，德國，俄國革命時封建領主那一特權等級。商業資產階級，不

但直接剝削農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產階級，并且許多衰微的地主正因為商業資產階級及富農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緊剝削農民以自存。在壟斷原料方面，城市商業買辦階級，使農民經濟陷於極困苦不自由的奴隸地位。富農占有較多的土地剝削雇農；高利貸所剝削的，不用說多數是貧農；包佃者對農民所取租額，當然比較地主所取得還多，他才好於中取利。所以商業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及富農和地主階級同樣是農民革命的對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們不但在階級比重上把封建勢力看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或者更強固些，最後更進一步否認了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你們從前肯定的說桂系和馮玉祥都不代表資產階級，隨後又說：「蔣介石并不等於資產階級」（三十四號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號紅旗）；那末現在中國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及其領導勢力是什麼呢？國民黨政權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義所表現的是什麼呢？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說有，既非桂

系，又非馮蔣，那末究竟是誰呢？如說沒有，那末，以前所謂『階級聯盟』，及所謂『資產階級背叛革命』都成了彌天大謊，豈非滑稽之至！大約是你們看見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國主義，并未能改良農民生活，并且牠戰勝了桂系反而馬上取消了已實行的『五減租』。你們對他很失望，所以說他不等於資產階級。你們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說：『假如馮玉祥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勢力，必須解放農民等等。』如此說來所謂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并不是現在實有的這些冒牌的資產階級，只有幻想着在你們頭腦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才算是中國老牌的真正資產階級。你們對於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的觀察，分明不是依照辯證法，在一切現象流變生長過程中，抓住現在實有的資產階級，而是依照形式邏輯，虛構一個超時間性的一定模型的資產階級。國際說你們『誇大資產階級』，正確點說乃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

這樣的幻想，決不能夠領導羣衆向當面的資產階級鬥爭，而是領導羣衆去尋找

你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你們心目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帶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期才有；現在不但在中國尋找不着，即歐美各國也都已尋找不着了。各國革命史已教訓我們；資產階級一抬頭，一看見下層階級有獨立的行動，馬上開始反動，毫不猶疑的和封建的舊勢力妥協，什麼無恥的反革命舉動都會做出來；這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歷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經濟文化落後國的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例外。所以我們不能除開現有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即是除開馮蔣等派這些反動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另外幻想會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動的；我們對於整個的資產階級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絲毫幻想，無形中幫助他們欺騙羣衆。

七 不錯，你們着實做過反對資產階級的宣傳，可是你們說了千遍萬遍反對資產階級的話，都被你們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打銷了。這是因為你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把所要反對之目的物（資產階級）從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們對於統治階

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分析，又把羣衆政治鬥爭的視線混亂了。因此，羣衆會向你們

們反問：誠然應該反對資產階級；但是蔣介石既不等於資產階級，馮玉祥也不代表

資產階級，桂系，閻錫山，張學良更不用說；那末，我們反對誰呢？我們的階級

鬥爭，是不是僅僅反對工廠主和公司老板們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說：你們以爲資

產階級還要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是否就是要反對幹這事

的人呢？更或者說：資產階級多少還有點這些企圖，雖然不徹底，總比封建階級

進步些，是否還要聯合牠，領導牠，爲實現這些企圖而鬥爭呢？羣衆只認識簡單

明瞭的事實，對於許多『然而』『雖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

學，不大理會，你將怎樣回答他們？黨內同志因爲你們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也

會復活他們對於資產階級之幻想與希望，并且覺着更反動的封建階級尚有這樣的強

固基礎，遂至推論到階級聯盟的老政策，在理論上現時仍有客觀的可能，遂至懷

疑工農單獨起來完成民主革命任務這一政策，失了理論的根據，莫非真是譚平山所

謂「超時代的政策」。諸加此類的右傾思想，都會跟着你們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發生出來。

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黨外的羣衆：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國民黨（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權，即資產階級爲中心爲領導的政權，已經是不會排斥帝國主義，不會肅清封建殘餘，不會解放農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並沒有也永遠不會有比國民黨各派較革命的資產階級代表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能夠徹底完成這些任務的，只有列寧當年在俄國喊出的「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過分的估量與宣傳，和盲動主義有直接的關係，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第一所謂革命高潮，乃是羣衆的革命鬥爭逐漸發展，匯合達到最高點，而不是陡然可以到來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徵象，必須是廣大羣衆的（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的）不斷的經濟鬥爭，有轉向總的政治鬥爭的趨勢，決不能把斷斷續續的經濟鬥爭，都當做革命高潮的徵象；至於因爲資本進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

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羣衆鬥爭本身而言，統治階級之內閣及中間階級之動搖，只是幫助革命運動易進於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勢力是高漲或低落，是黨決定政策時客觀的估量，而不是向羣衆宣傳鼓動的口號，我們固然不能向羣衆宣傳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羣衆宣傳什麼「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使羣衆以爲在他們自身鬥爭之外，另外一個什麼革命高潮將從天上降下來幫助他們，一切問題都靜候他到來解決，因爲他就快要到來了。

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會到來，這種取消派的見解，自然是不正確；因爲中國的資產階級並沒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足以消盡現實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說解決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從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個不同點，決定俄國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見列甯「俄國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多數派也曾指出俄國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國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決定了俄國無產階級的戰略，這都非常正確。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宰制之下的

中國資產階級，除了孫中山及其黨徒的夢想，他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可能性，不但遠不及經過畢士馬克時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國，并且還不及斯特黑併時代的俄國。中國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來之可能，至於幾時到來，却沒有人能夠預言；只可說不會快要到來，因為現時羣衆雖有些鬥爭，而拿他當做革命高潮到來的象徵還太不夠。

現在是一種什麼時期呢？我們怎樣工作呢？前一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後一個革命高潮還未到來，并且還沒有到來的徵象，現在還是兩個高潮間過渡時期，在這過渡時期中，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工作路線，便應該和這個時期相適應，即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所說的：『過渡期之特殊任務是準備力量，集中力量。』我們要準備集中力量，首先要剷除盲動主義的精神，低下頭來設種種方法接近羣衆，然後才說的上推動羣衆向前鬥爭，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我們只有『到羣衆中去』才能夠推動羣衆，不應該也決不能夠站在羣衆外邊，命令羣衆，我們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

，來推動羣衆的實際鬥爭；不應該用臨時拉夫的辦法，來製造羣衆大門爭的空氣，我們的工作，應該切切實實推動羣衆不斷的鬥爭，在客觀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線進行；不應誇大吹牛在主觀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路線進行，誇大吹牛，不但要助長同志們的盲動主義，同時也要助長他們輕視日常瑣細鬥爭的心理。一般的合法運動，自然是放棄革命之企圖，但在一定條件之下，爲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這個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斥，列寧在一九〇八年，爲此曾和多數派內排斥一切合法手段的『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鬥爭。

當然，羣衆的力量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並且羣衆『自發的』鬥爭發展到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傾向；但這決不是黨以命令強迫少數羣衆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現一下，或者喊幾聲我們發下的口號可以冒充的，羣衆上街示威，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每次號召羣衆示威運動，也都要有嚴肅

的精神與意義，不可常常隨便把他們領到街上玩弄；至於根本就還沒有羣衆，也要命令同志充當羣衆出來做示威運動，以便證明『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之說絕對正確，這種把戲更萬分玩不得的。這樣的玩弄，這樣的把戲，誇大主義者（即盲動主義者）無可如何的這樣的最後的手段，決不能增加黨的力量，只有削弱黨的力量；決不能取得羣衆，只有喪失羣衆；決不能促進革命，只有斷送革命。

當然，我們領導羣衆做一切鬥爭，必須指出總的中國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羣衆感覺着一切鬥爭，好像是盲行大海中，絲毫也看不見彼岸的遠景。並且，中國革命也不是沒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羣衆在不斷的鬥爭中積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裝暴動的力量，和宰制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劇烈衝突，國內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的衝突所加於中國各下層階級之榨取與痛苦及因此而發生絕大的經濟及財政恐慌等事情結合起來，那時廣大羣衆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時我們的黨在羣衆中如有強固的領導力量，革命必然獲得勝利，簡單的急性的屢次預約革命高潮快要

到來，而事實上屢次沒有到來，這種『打嗎啡針』的辦法，決不能使羣衆明確的認識革命前途，其結果只有使羣衆失望，減少了革命情緒。

九 盲動主義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國際所指出的事實外，在此次『五卅』運動中，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舊根性，由事前誇大的企圖和事後誇大的報告，完全暴露出來了。

不認識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不認識統治者的階級性之轉變，以爲現在國內戰爭的性質和從前是一樣，統治階級將因之崩潰；不認識現在還是革命兩個波間過渡期，把羣衆鬥爭程度誇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雖然經過六次大會以後，不便公然說中國革命高潮仍舊是一直高漲，只好說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最近索性更進一步，換一句更確定的話說：『革命復興』；并且以爲『各國工人階級鬥爭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尤其是日益激烈起來』。現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劇』時期（四十號通告）；拿這樣錯誤的政治認識與誇大的估量爲前提，以爲在這樣好的革命環境，自然應該

『動』，一點也不『盲』，從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好誇大的人，永遠是盲動主義者，永遠自己不承認是盲動主義，永遠不認識盲動主義，把他當做真正布爾塞維克主義，把他當做革命的正確路線。

你們在此次『五卅』運動前政治的估計，是統治階級動搖，然而經過蔣桂及蔣馮衝突後，他動搖了沒有？又說是改良派的勢力縮小，然而對中東路事件各工會一致發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勢力縮小沒有？又說是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之進展；然而爲什麼你們還要用那斷然用不得的辦法，派幾個同志到老怡和及恆豐紗廠去強自關車呢？你們在此次運動中所取政策，完全是從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貫的命令主義，『可恨的只是這些自發的革命鬥爭已經進展的羣衆，在革命運動現在這樣緊張的時期』（江蘇省委委員的話），不聽命令去革命！從前盲動主義極盛時，有人說：『中央罵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罵區委不革命，區委又去罵支部不革命，支部去罵誰呢？只得罵羣衆不革命。』這樣的怪現象，現在仍舊存留着，省委委員因爲

工廠罷工辦不到，遂逼着下級黨部下命令罷工，說：「在原則上必須罷工。」這是什麼話？！你們忘記了列寧「罷工與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識和自由意志來決定」的遺教了嗎？你們不是根據羣衆的鬥爭情緒和意志來決定黨的政策，而是拿黨的政策來決定羣衆的情緒與意志。

「五卅」運動應該儘可能的努力去做的；所得的成績無論如何小，都有相當的意義；這都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但根據你們盲動主義的精神，在事前誇大的企圖和事後誇大的報告，都給了黨內黨外羣衆很壞的影響，以至有了「強迫同志吹牛皮」的謔評。

在客觀上看來，即以上海一隅而論，我們若有正確的估量（非誇大的）和切合羣衆實際需要與可能的政策（非誇大的），羣衆鬥爭是能夠逐漸開展的，我們和羣衆的關係也能逐漸恢復的；可是下級黨部同志們刻苦工作所得的一點效果，決敵不過中央機關盲動政策之摧毀（例如郵政工會及恆豐老怡和事件），在這種狀況之下令

同志們如何能夠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爲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卽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委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黨內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謨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並不是什麼「相當縮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們對於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見一概不許開口，從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問題，都成了機械的「中央命令傳達機關」；這樣的辦法，爲了操縱一切使盲動的命令能夠順利的施行，自然覺得很方便，其如毀壞了黨的組織與力量何！倘若現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之下，黨內德謨克拉西勢必縮小到連區委

支部都不能行選舉制；這根本上連少數人都不能集會，一切工作都無從談起，黨內的基礎組織便已經不存在了，還說什麼黨已有相當的發展，還說什麼革命復興！倘若說他們的觀念都不正確，只有中央政策是對的完全對的，他們盲動執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線若有小小的不正確或大大的不正確，則是否需要「自我批評呢」？

列寧說過：「我們的機關報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爭論，寧可說，爲了說明現存之意見相差深到若何程度，爲了爭論諸問題的全面討論，爲了討論諸種見解之代表者等，陷於褊狹性之鬥爭，在每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有意識的勞動者面前公然爭論，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見解，而缺乏公然的爭論，把關於真實問題之不同的意見隱秘的擱置起來是現代運動缺陷之一」（火花發刊宣言）。他又說過：「一切團體員，選舉代表者，同時獨立的各自對團體全部利害的爭論題目，都有陳述意見的必要，民主的組織之黨也沒有例外，徵求所有黨員的意見，不能視爲原則上

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場合，例如罷工，選舉，大規模的杯葛（Boycott）特於政治的行動』（『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說過：『中央委員會知道黨員大衆之意識的意見，從而不是盲目的指導大衆……』（同上），他又說過：『在我們的報紙上，努力給關於理論問題的論文佔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慫恿同志們對於爭點無忌憚的發揮』（『我們的綱領』）。

同志間關於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論，是黨的進步的現象，決不是壞現象；反之，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這正是黨之幼稚的表現，爭辯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會爲大衆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衆批駁下去，以後才不至隱藏在黨內，遇着機會便要發作出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理論，就是長期在這樣的爭辯中生長出來的，我們同志政治水平線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見的相互爭辯中增高起來；決不能拿出陳套話什麼『程度不夠』（又是造謠，中央只說在目前白色恐怖的嚴重環境中，黨的主觀上無產階級基礎薄弱，黨的民主化是要相

當縮小的。——編者）的理由，以為必須他們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賜』他們發表意見的理由，你們主張：黨內民主化是要依着黨員政治水平提高而擴大，黨員政治水平低便應縮小；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們老是固執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蝎，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的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公開的理論爭辯尚未被容許開始，你們突然發生『反對黨內和平』的口號了，這是因為少數派的階級聯盟政策及經濟主義取消主義，一貫的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無

產階級的根本戰略，目前在中國黨內，如有人以為中國還是封建勢力所領導的統治，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仍主張什麼『四個階級聯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為資產階級的發展已消盡了中國革命之可能性，革命決不會再起，黨當然要和這班人不願黨內和平的鬥爭，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錯誤，我們可以用教育及爭辯方法來矯正，用不着小題大做，拿『反對黨內和平』這種嚴重的口號來代替『團結黨內爭取羣衆』的口號（有人說這是六次大會喊出來的口號，又有人說是國際代表個人的意見，未知孰是？）至於同志們沒有任何錯誤，只是『和中央意見不同』便是錯誤，而且是很嚴重的錯誤，便要拿『反對黨內和平』的口號來對付他們，這更是天大的笑話，同志無論在理論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離開革命的立場和黨的立場，即和中央有顯然不同的意見，而公然出來爭辯，都是黨內德謨克拉西所容許的。（只有革命戰爭緊急時，這種德謨克拉西才應受限制，甚至於一點也不能有；然事後的自我批評仍須是德謨克拉西的。）

我會見過一些會爲黨努力工作或現在正爲黨努力工作的同志，說他們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許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來。我曾很誠懇的指出他們的錯誤；有意見應該向中央陳述，或在黨部開會時提出討論，不應只在個人閒談。他們都很慘痛的回答說：『你的話在原則上是對的，可是在事實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偵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機關都有，只要你一開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調到萬難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遠地方去，甚至教你從黨滾出去；我們是不忍心離開工作的，你說怎麼辦？』現在有許多同志，都因爲這樣情形煩悶着沒有出路，而灰心喪氣，而取了消極態度，或是嚴守『休談國事』的教訓，敷衍的做着工作再說，而沒有一點興奮精神，或者找個機會給敵人殺了完結，大家都感覺到這不是好的現象，然而沒有辦法！』（這些完全是謠言，是獨秀陰謀破壞黨分裂黨之最無恥的煽動同志反中央的話——編者）

聽說布哈林曾責備特立說：『你是個政治家，不是小孩子，爲什麼對於盲動主

義有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來！」列寧常常說過：『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是有政治自覺的』，黨教育黨員，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覺的戰士，而不是要教成隨聲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馬，不是要教成純粹的雇傭勞動。只要不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便不能不承認『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機器不同』，照你們現在的辦法，你們褊狹性一致的團體即或造成了，而各個黨員都有政治自覺，能夠自動的奮鬥活潑有生氣的黨在那裏！？

十一 綜合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出你們有系統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組織上一貫的錯誤路線。為改正這些錯誤之總的路線，我現在提議幾個要點：一、在政治上對於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問題，對於革命高潮問題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麼時期問題，對於富農政策問題，都需要重新有個正確的決定。二、在組織上，儘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謨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

法的自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三、更有一個根本而緊急的問題：六次大會對於黨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討論，七次大會又不能即開，應由中央及地方把黨的全般政策之各個問題提出於全黨黨員之前，要求每個黨員都充分發表意見，儘可能的在黨報上陸續公布，以便形成多數意見之一致，即真正黨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黨的政策，以便決定黨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確路線，必如是才能統一整個黨的意志，才能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才能喚起全黨黨員對於工作自動的努力，對於鐵的黨紀自覺的服從；必如是才能使黨復興，使革命復興！

十二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們：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這封信貢獻於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狹性，平心靜氣的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并希望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

此致革命的敬禮！

獨 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文中幾個完全造謠的地方，略加了短註——編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067B

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總發行處 上海民志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